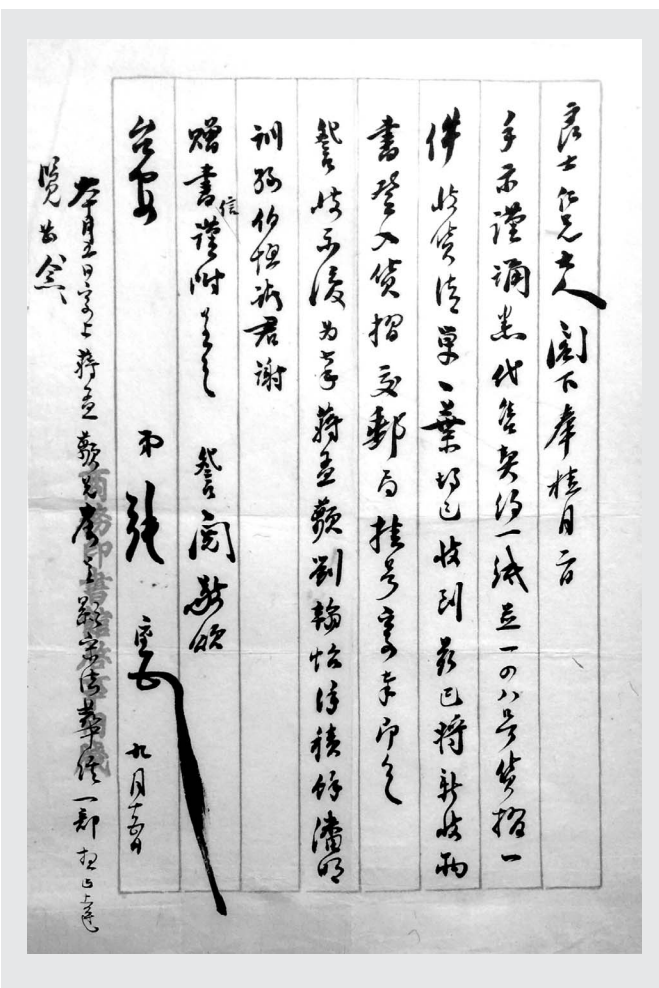


●管继平

■文人尺牍(二十四)

鸡黍共君情似昨

——张元济致瞿良士



严格科考制度的训练有关,他能写一手标准的唐楷,风格介于欧阳询、颜真卿之间。我曾看到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套“习字贴”,其中《国民学校习字贴》第一册“楷书描红”,即署“海盐张元济书”,由此可见其楷书的功力。这一叶张元济致瞿良士的书札,毛笔书写在米黄色的八行“商务印书馆启事用笺”上,笺纸的右下角略有缺损,但无碍大体。全信文字不多,照录如下:

良士仁兄大人阁下:

奉桂月二日手示谨诵悉,代售契约一纸并一四八号货折一件,收货清单一均均已收到。兹已将新收两书登入,货折交邮局挂号寄奉,即乞答收,示复为幸。蒋孟莘、刘翰怡、徐积馥、潘明训、孙伯恒诸君,谢赠书,信谨附呈乞答阅。敬颂

台安!

弟 张元济 九月十五日

本月五日寄上蒋孟莘兄属呈影宋法华经一部,想已达览。甚念甚念。

“良士”是民国著名藏书家瞿启甲的字,其别号铁琴道人,乃清代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。瞿家为江苏常熟藏书世家,自乾隆年间起,历经五代人艰苦积聚,珍本佳槧达数十万卷,铁琴铜剑楼亦为清代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。据说晚清时的张之洞,鉴于“皕宋楼”珍本散失之教训,曾派缪荃孙等建议将其“铁琴铜剑楼”藏书

归入京师图书馆保存,并许以“三品京堂官”之职和三十万银币,然瞿启甲认为先代藏书当世守之,因而拒不奉诏。

这封书札据《张元济全集》记载,应写于一九二三年八月。笔者为此专程请教了张元济先生的嫡孙、如今已耄耋之年的张人凤先生。人凤先生说,当年编全集时,他曾于瞿家后人手中抄录了数十封祖父致瞿良士的信件,此信也在其中。现全集共收录张、瞿往来信札一十八通,此为第五通。该信内容与前几封信稍有关联,主要是瞿氏与商务之间的古籍寄售和影印本代售之类的往还事宜。信中的“蒋孟莘、刘翰怡、徐积馥、潘明训、孙伯恒诸君”,皆嗜好古籍之藏书家也,孙伯恒还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经理,因前信中提及,瞿氏将有些珍本影印,其中有一种《中原音韵》,张元济求留下五册样书分赠同好,获瞿氏慨允,故寄赠上述诸君后均表示了谢意。

张元济先生与瞿良士有着非常深厚的交情。为了抢救保存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商务印书馆在购藏整理、校勘影印古籍基本上做了大量的工作,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,张元济先生提出了辑印大型古籍《四部丛刊》的设想。定下书目后,其中不少佳槧善本须借自于国内外大藏家,为此,张元济也得到铁琴铜剑楼的鼎力支持。瞿认为印书乃嘉惠后人之善举,他素来主张“书贵流通,能化书千百,得以家弦户诵,善莫大焉”。而张元济在日本考察时,发现日本内阁文库内有“铁琴铜剑楼”所缺的版本,也非常兴奋,归国后也立即致信瞿良士,通报此事。全集中写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那封信中即云:

“弟在日本勾留一月有半,参观公私图书馆,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。承假抄本《北洞诗集》,彼士乃有宋刊。《平斋文集》《黄文獻集》均有宋元足本可以补全,殊为快事。昨三兄过访,曾以面告。《平斋文集》尊处藏本阙字,弟均校补,所阙八卷,散处影照如能商妥,可以奉借抄配,俾成完璧。想兄闻之亦为之喜色也。”

爱书者遇上孤本奇书,往往是废寝忘食、荣辱皆抛的。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,为了让读书的种子生生不息,他们都怀有共同理念。所以,在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,与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合作友谊。瞿启甲逝世,张元济作了八首绝句诗,深深怀念这位藏书大家。其中有“鸡黍共君情似昨,人琴剩我首重回”句,把两人的友谊比作生死之交的范巨卿和张元伯,高山流水的俞伯牙和钟子期……可见感情之深,诚无人可替也。

尽管瞿良士为了先人的藏书,面对朝廷的高官厚禄也不为所动,但他也知道,真要想世代永保之其实并不现实,因此瞿良士临终时嘱咐道:“书勿分散,不能守,则归之公。”其子瞿凤起承其家藏,属铁琴铜剑楼的第五代藏主,与张元济先生也是往还颇多的好友,曾帮助张元济集印《四部丛刊》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等巨编。但到了四九年之后,瞿凤起最终还是如父辈“归之公”所言,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分别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等机构,而中国近现代史上“铁琴铜剑楼”的藏书传奇也终告华丽落幕了。

物之聚散如人之离合,是永远逃不脱的宿命。不光是藏书,就是张人凤先生曾从瞿家后人手上抄录的十余封信札,如今也多德从拍卖图册中出现,由此星散四处了。虽说未免有遗憾唏嘘之感,然而现实往往也就是如此,缘来缘去,世事轮回,要不,怎么可能轮到区区也幸获菊生老的书札墨宝呢?

●王德彦

海派书家捭谭(十)——吴大澂

●王德彦

吴大澂作为海派书家的重要一员是没有异议的。但吴大澂一生为官,历任陝、甘学政,河南、河北道员,太仆寺卿、太常寺卿、通政使,左都御史,广东巡抚、湖南巡抚等职。曾参与中日、中法战争以及东北边疆防御,勘定中俄边界,奉命会办北洋军务等国家重大活动,可以说几乎是游走了全国各地,而真正的寓沪时间并不长。虽然吴大澂的寓沪时间不长,但与海派书法的关系确实是极为密切的。

吴大澂之所以被公认为海派重要的书家之一,理由主要有三:一是吴湖帆是吴大澂的文孙,吴大澂对吴湖帆给予厚望,曾云:“此子他日必有所成”。吴大澂弥留之际谓家人曰“有嗣如此,死复何恨!”遂将所积聚之财物分为二,一份给两个女儿,一份给了他寄予厚望的侄孙吴湖帆,并将其所收藏字画彝鼎多归吴湖帆,意在让吴湖帆继承家学。2015年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“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”好评如潮,此展与本文的主人公——吴大澂就有密切关系。第二点理由是:吴大澂祖籍苏州,在寓沪前吴大澂就与许多书画家结社切磋书画艺术,“戊午己未年余与雒南陶绍原结社于虎丘白公祠,同社者,倪君小圃,周君存伯,黄君秋士,包君子梁”,他们“朝夕谈论画理,无三日不见”。还有许多其他的海派的重要人物如吴昌硕、王同愈等都是在苏州结识的。三是吴大澂曾两次寓沪。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,1860年,太平军破江南大营,江南士绅纷纷迁徙。四月初太平军陷常州,吴大澂于六月奉祖母迁至上海。这次寓沪期间,吴大澂参与了菊花社书画会,曾与吴石仙、顾若波、胡公寿、钱宪安、倪墨更、吴秋农、金心兰、陆恆合称为“菊社九友”;另一次是在中日甲午战争起,吴大澂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域,因兵败革职,次年回沪后一度主讲龙门书院。关于这两次寓沪,《海上墨林》都有记载,但这两次寓沪的时间加在一起,也不过三年时间左右。因为第一次是在咸丰十年(1860年6月)寓沪,同治元年(1862年)“五月有上海乘夹板船抵津,六月到京,寓延寿寺街长元会馆。场后留京,彭文敬公邀往小麻线胡同课其公子祖润,及孙福孙榴仙部郎之子也。”第二次寓沪是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“得仲午书,意斋新得上海龙门山长”,但次年“春间,先生病重,不能言,每食辄呕。冬月,先生病甚危殆”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正月二十七日,寿终于苏城封门内南仓桥新宅。六十八岁。

吴大澂(1835-1902),初名大淳,字止敬,又字清卿,号恒轩,晚号意斋,江苏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。清代官员、学者、金石学家、书画家。清同治七年(1868年)进士。善画山水、花卉,精于篆书。皆得力于金石鉴赏修养。

在2017年央视春晚上,五位“重量级”书法家沈鹏、李铎、张海、苏士澍、孙伯翔各自书写了一幅“福”字作为春晚奖品,也预示新年五福临门,送福纳祥。没想到,第二天媒体宣传“春晚让书法火了”“书法的春天到了”,那微信圈更是一片哗然。

有的说书法上春晚是好事,的确让公众更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。但是这几个字真不是很耐看,不知道是不是我要求太高?“这样的水平,代表书法家向世人展示,个人认为欠妥。”有的说:“通过观看留言,感悟国民的审美水平再不提高,国艺后继无路。”“为什么自己不提高审美,而是需要书法工作者迎合你的口味?”也有的说:“央视在选人上可以说是下了大功夫的,选的都是当今中国书法界的大师级或领军人物,也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代表人物。”“专业审美与大众审美的确有区别”;“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”等,真是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赞扬的、批评的、担忧的兼有。

其实,书法上春晚或者说在春晚的节目里有着书法元素的并非首次,而且,每次出现都会引来一些议论。比如,2011年春晚,周杰伦演唱的《兰亭序》,有人说:听此曲不但不能让我们联想起王羲之的41位江南才子相聚兰亭吟诗作画,挥毫泼墨的场景,反而给春晚带来一丝沧桑与无奈;2012年春晚,玖月奇迹在演唱《中国美》时,舞台大屏幕出现张芝《终年帖》局部,以及整台晚会滚动播出的范曾写的“福”字。有人说,《终年帖》为何不忠实原作,没有必要去艺术处理?为什么让范曾写这个“福”字?2014年春晚,央视为了增添喜庆气氛,特意策划了“马年春晚春联征集优秀作品书写大会”,此活动是在央视网演播室举办的,当时邀请了胡抗美、李刚田、刘文华、张继、龙开胜等二十余位书法家书写春联,也是作为春晚的奖品。有人说,怎么把他都请来了?怎么没有邀请谁谁谁参加呢?2016年春晚,在节目魔术《家的想念》中又穿插了“书法”元素,表演者无需用手,毛笔就自动在纸上书写出了一个“家”字,也遭到有人批评,这是在糟蹋书法!这是把书法当“儿戏”。今年的春晚,可能是书法“动作”大了一点,关注的人也多了起来。由此,这也反映了近年来书法已进入到了群众的生活,进入了大众的视野,用一句比较体面的话说,书法上“春晚”,在批评中折射出了国人对文化、对艺术的诉求。

“五位”书家为春晚“献礼”笔者是由衷的致敬。从电视上看,他们书写的“福”字尺幅不小,可属榜书了。他们的年龄也不小,沈鹏先生86岁,李铎先生87岁,孙伯翔先生83岁,张海先生76岁,苏士澍先生68岁,在这样的年龄,又在摄像机镜头下,其书写环境、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位网友说的实在:等您80岁后,您可以书写吗?就像几年前有人说,90岁才有可能去“竞争”西泠印社社长一样。“五位”书家不是有的人想象中的等闲之辈,而是有着对艺术一生追求之人。应景书写与书斋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作品还是有其区别的,这一点“圈外”的不一定理解,“圈内”的应该知道,书法上“春晚”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书写作品的本身。平心而言,“五福”也不是有的人说得那么“糟”,那么“恶心”。不妨,您可以关起门来,在自己家里画画,写这样大的字是否容易?当然,有的观众的建议笔者还是赞同的,比如,推荐大家喜欢的书法家上“春晚”;如果“五福”用“真草隶篆行”去表现可能更佳等。

笔者是一个“联想”之徒。此时,想到了春节前,不少书法家送“福”送春联的情景,上场的人绝对没有上“春晚”那么高的要求,只要你敢写,愿意写,都可以去写,就是写了“错别字”,群众也不好意思指出,因为你在送春联;想到了去年G20的大牡丹;想到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书写的指示牌;想到了那些在外国人面前展示书法篆刻的人;想到了正月初四22点38分,央视“开拼啦”中国书协副主席陈振濂老师的演讲:汉字是什么?书法是什么?他说:书法是一个表达,一个倾诉,一个传递我们审美的方式。学习书法需要培养一种审美。他还指出:由于书法的门槛很低,造成了书法圈里鱼龙混杂,有的钢笔字写的七倒八歪的,他也敢拿起毛笔在宣纸上泼墨写字,还敢说是书法家。

……

打住!还是不联想为好。

早在一百二十年前,上海青浦人夏瑞芳与宁波鲍咸恩、鲍咸昌昆仲以及同乡高凤池四人,集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,成为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标志。四位年轻人都曾是当时南市的清心书院同窗好友,鲍家的父亲还是清心教堂的牧师,“商务”之名,也得之于鲍家在清心书院任教的大姐。说起来还真有一份亲切感,商务印书馆的缘起,正来自于清心书院,而这清心书院,现就是距我家不远的陆家浜路上,今市南中学也。校旁的清心堂依然宛在,清雅静致,虽是一九二三年自书院中移出重建的,但今仍在使用,每每路过,偶尔还能听到从内传出圣颂的歌声。

当然,商务印书馆创办伊始,在江西路的德昌里,只能算是一个印刷小作坊,买几台手摇印刷机,招几名工人,印印商业账本、教会图书之类,随着经营有方,业务日渐扩展,富有远见又有魄力的老板夏瑞芳,于一九〇二年,请来了张元济先生任编译所所长,从此,商务印书馆编译、印刷、发行三头齐进,以“昌明教育、开启民智”为使命,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早期推动者。应该说,商务印书馆的开创之功,夏瑞芳当仁不让;而其后来发展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,居功至伟者,无疑要首推张元济先生了。

张元济先生是浙江海盐人,字筱蓑菊生。他七岁入塾,在读书上显示出过人的悟性,尤其是他的科考之路,走得相当顺利,从十八岁考秀才开始,到二十三岁中举人,二十六岁中进士入翰林,他几乎是每考必中,仅用了八年时间,走完了科举教育的全部历程,至三十岁时,已官至总理衙门章京,应该说,他也是清廷科考制的获益者。然而一心报国的他,亲眼目睹满清政府昏庸腐败的现状,又十分反感。于是,他思想激进,参与变革,与维新派打得火热。孰料随着戊戌变法失败,新党纷纷遭捕,维新改革之梦也被一时扑灭。张元济后总算在光绪帝的暗中保护下,保住了脑袋,但被处以“革职,永不叙用”。郑逸梅的《艺林散叶》中有一条云:“张元济曾参与康梁变法,事后犒一章;戊戌罪人,作书偶饮之。”自称“罪人”,是愧是讽,还真难以言说,也许是他别有寓意罢。

革职后张元济携家南下,从此在上海开始了他的教育文化事业。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屈辱和戊戌变法的失败,眼看着“大厦将倾,群梦未醒”,张元济觉得唯有“开启民智”,才是救国之本。于是,他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,翻译出版政治、法律、商务等书籍,并任南洋公学代总理,开办附设小学堂,与蔡元培等创办了《外交报》……后应夏瑞芳之邀,又辞去了南洋公学总校之职,来到商务创立了编译所。而商务印书馆也因张元济先生的加盟,一大批文化精英纷至沓来,如蔡元培、高梦旦、蒋维乔、杜亚泉,以及后来的茅盾、王云五、郑振铎等,使得商务馆蒸蒸日上,连创佳绩。可见企业的发展,关键还是在人才的引进,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刷所迅速发展成国内出版界权威的缘故。张元济后曾有诗曰:“昌明教育平生愿,故向书林努力来。此是良田好耕植,有秋收获仗群才。”这致力教育、依仗群才,则成了他一生的价值取向。

今年恰逢张元济先生一百五十周年的诞辰纪念,说来也是缘分,前不久,朋友知我喜藏文人士尺牍,故割爱让了一件菊生老的信札予我,使敝篋又增添了一重量级文人之手迹墨翰,好生欢喜。张元济的尺牍体书法,得之于楷书的深厚基础,写得非常浑厚。虽行中带草,但雍容而有矩度,并无太多的随意草写或难辨之字。这其实与他早年受

2016年优秀通讯员感言

这是我第二次获得“优秀通讯员”这一荣誉,感到既荣幸又充满感激,协会的肯定和认可是我继续追求和前进的动力。

2016年里,我在《上海书协通讯》陆续发表了《群文璀璨书画飘香》《普陀教育书法培训基地的建立对区域书法教育普及的意义和影响》两篇反映上海书协活动的文章和一篇《韩文书法印象——访庆武理事长专访有感》的人物专访,参与了“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”和“上海市第九届书法篆刻大展”两大系列活动的新闻宣传工作,完成了10万余字相关活动资料的整理和部分活动通讯稿的撰写等工作。今天回过头再来看看那些日日夜夜,感觉自己确实也随着一次次笔耕在不断成长。

早在两年前书协成立通讯员队伍的时候,潘善助秘书长将其定位成集报道、采访、研究为一体的这么一个团队,协会也寄予了相当的期望。当时的我尽管稚嫩,但协会领导仍愿意委我以重任,我从心里感激这份信任,认真把事情做好成为我唯一的信条。此次蒙协会关爱,得享殊荣,欣喜之余,我更清楚未来还需要提升。吾当继续努力,履行通讯员职责,不负“优秀”之名。

一篇新闻,一份报纸,一个声音,一种天气,一份宣言,一类思想,一个漩涡,一场戏剧,一次诞生,一扇天窗,一束光芒。一朝结缘,“一”的世界便在我面前铺展开来。

我在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刊发的第一篇评论《书法天空的守望者——杨耀扬书法艺术》,作为《书法导报》特约记者撰写的第一篇新闻是对《上海书协临摹与创作活动》的报道,发表的第一篇人物访谈是《70岁以后,从零开始——海派名家钱茂生专访》。作为上海书协会员和通讯员,我有机会参与了书协组织的一些活动,在有关《上海书协通讯》无数美好回忆中,印象最深的是与书法界前辈们的接触,我先后采访了钱茂生、丁申阳、水赉佑、潘良棋、顾振东、张晓明、林仲兴、王振远、徐正濂等,每一个人都是一扇窗口,这些前辈的人品艺术品和不计名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令人感动、学习。感谢上海书协提供平台让我成长、收获并得到提升。

《上海书协通讯》至今200余期,历时16年。它是守望书法传统文化的主阵地,是搭建书法艺术展示和交流的平台,是展现上海书法创作、研究成果的一块沃土,也是人才成长的摇篮。一天,一年,一个季节,一个书写者与一个时代,唯

幕刚刚拉开。

陈晓:书协通讯员,它不同于一般,专于负责整理、撰写、发布时事性、报道性的文章,除此之外,凡书法批评、随感、理论的文章,也在范畴之内。因此,书协通讯员应该要在感受和思辨上多加开发,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时效性的短、平、快。当然,这也不是说我们在报道时事或记录会议文档时,需要依赖形象和感觉来修正精确,这种规范无需严格的统一,但必须要强调其中的复杂性。

于是,这就牵涉到书协通讯员在平衡以上几种品质时所采用的媒介——语言。为了尽量接近我们所期待达到的效果,我们也尽量去磨练每一关键的语句,来确定究竟该以多少的独立人格来追求新闻或艺术的真理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得裨益于整个通讯员团队因人而异的语言特质,各有偏倚的观念和手法为每篇通讯增添了的特有的生命力;同时,最终的成文也得裨益于书协领导及媒体编辑在审稿时公正、严肃的责任意识,使通讯也不会沦为个人情感的过分宣泄而失去规范。

另外,我们也要考虑到对于读者(书法工作者)的理解,这种理解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,这时,与时俱进的审视能力就格外重要,这包含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和态度。

很荣幸这次能被评为优秀通讯员。我想,作为一名书法工作者,除了本份地永远致力于创作之外,也要多一些时间来致力于这些文字类的工作,这既实验了“实践出真知”这句话,也打破了艺术创作和理论之间原本有些冷漠的互视态度,毕竟,我们有自信,在自己实验的这片土地上继续前行!

俞海滨:1月13日,接到“上海文联”通知信息,大意是请谈谈今年上海书协优秀通讯员获奖感言。平时遇到愉悦之事总会即兴随笔,但那天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关于通讯志愿工作,结合我对上海书协会员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可以得知一二,不少书法家尤其是那些老资格的都不“乐意”写,解释原因很简单也很实在,有说写稿辛苦麻烦,有自我体会不如写幅书法或刻枚印章轻松,也有“敢怒而不敢言”,等等。当下书法生态是多元的,比如书协会员中既有业余嗜好的,有职业生存的,也不乏江湖一世的,而且各有各的存在空间和既得利益,这就是现实。但书协通讯员——这个平凡角色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。如果这些“志愿者”有常识,客观而忠实记录,又有视野(奢望),我想大概就是真正“智囊团”角色的转换吧。

书法上「春晚」又咋啦?

●简斋

■简斋闲语

(下转2-3版中缝)